

「黑死病」肆虐香江



▲香港醫學博物館 王鉅科攝

時光倒流

位於香港島中西區上環及半山區之間一帶的堅巷二號，有一座紅磚砌成外牆的建築物，那便是「香港醫學博物館」。

博物館的所在地，正是十九世紀末讓香港人「人人自危」的鼠疫爆發地的重要遺址。

鼠疫即當時使人聞風喪膽的「黑死病」。

黑死病在一三四〇年在歐洲肆虐，而「黑死病」之名是當時歐洲的稱呼。這場瘟疫當年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約七千五百萬人死亡，約為中世紀歐洲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三十。

黑死病於一八九〇年席捲南中國，其後又蔓延至香港。

一八九四年五月，建滿中式樓房、地點與醫學博物館非常接近的太平山區爆發嚴重的瘟疫，香港當時的衛生局為控制疫情而採取非常防禦措施，包括逐家逐戶搜尋患者、為受影響的房屋進行消毒、快速處理屍體以及設置醫護專船把病人隔離。

然而，由於因為當時華人對西方醫藥仍深存恐懼，有些死者親屬，竟將屍體棄於街頭巷尾，以逃避「隔離」。

鼠疫最後雖然得以緩和，但往後的二、三十年間，鼠疫仍然是讓香港衛生部門十分頭痛的一個難題。

一九〇五年第十二任督督卜力建議興建一細菌檢驗所，後易名為「香港病理檢驗所」，以應付當時流行的鼠疫。檢驗所最初只對流行細菌病作專門研究，隨後更引伸至疫苗培植的工作。

一九六〇年「病理檢驗所」遷往西營盤，而疫苗製造的工作亦在一九七三年結束，這座建築物便被用作倉庫，直至一九九〇年被香港政府宣布列為法定古蹟，在一九九五年移交香港醫學博物館學會，改建成為香港醫學博物館，並在一九九六年對外開放。

從博物館露出往外望，下面的卜花園的所在地原為密麻麻的舊樓。當年疫症發生後，政府把民居剝平以杜絕疫症蔓延，後於原址建成公園以紀念此場瘟疫。

(摘自《香港倒後鏡》，坤林出版社)

圍村：香港早期鄉村建築

□林社鈴 何志清

香港的圍村，在一六八八年只有十九條，至一八一九年，在百餘年間已增加至二十九條。最早興建的圍村是衙前圍村，也是現時市區內碩果僅存的圍村，可追溯至宋末。本地圍村的平面布局多為正方形或接近正方形，而唯一的入口開在圍牆的正中位置。圍村建築除了達到防衛的功能外，實際上是由宗族管理的一個小區。

香江回眸

香港人類聚居的歷史可遠溯至新石器時代。但根據信史的記載，則可追溯至宋末帝昞、其弟衛王昺與逃難元軍追襲，南逃暫居於現今九龍城半年；其後二帝西遷新會崖山，一部分士兵及軍眷並未隨行而定居境內。大量人口的增長則始於清政府完全撤銷「遷界令」（一六八三年）後，當時還回的人口不足一千七百人，但大規模的外地人——尤其是客家人，卻由粵東遷徙至此。

最早圍村是衙前圍

香港最早興建的圍村是衙前圍村，也是現時市區內碩果僅存的圍村，可追溯至宋末。

南遷的新移民不是散居在本地人的鄉村裡，就是聚居在較貧瘠的土地上，基於貧富懸殊、文化背景及生活習慣的不同，難免與本地原居民有所衝突。因此富庶的村落，都建有圍牆保護村內的房產，更有在圍牆角加建更樓，入口裝鐵閘，及在牆外挖掘護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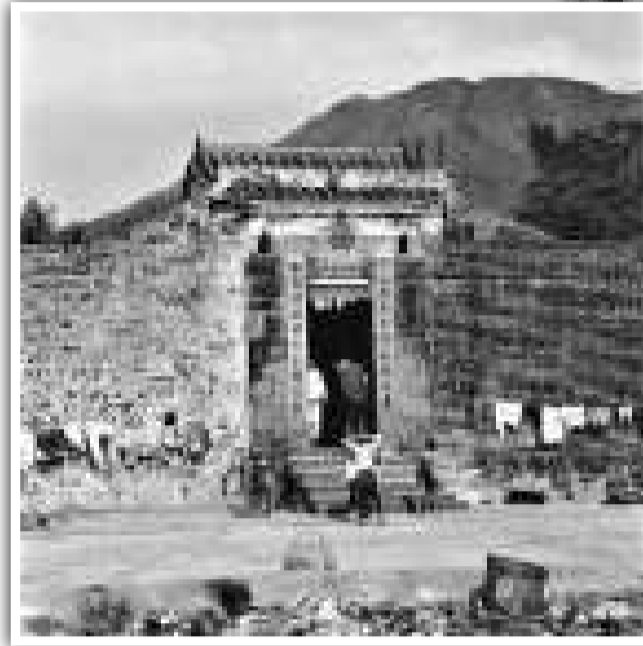
建於一四六五至一四八七年錦田吉慶圍的圍牆則是在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年所加，而錦田吉慶圍及粉嶺龍躍頭圍則可說是此類圍村的典範。可是，今天這兩個圍村的護城河亦已填為平地。

根據《新安縣志》記載，本港的圍村在一六八八年只有十九條，在百餘年間至一八一九年已增加至二十九條。

圍村建築除了達到防衛的功能外，實際上是由宗族管理的一個小區。因防禦的需要，必須準備長時期把入口關閉以抵抗強盜或敵人進侵，故圍村內一定要有自供自給的基本能力，所以水井在每個圍村內都是必須的，而且也會飼養家畜。

建築不乏本身特色

在廣東一帶，圍村的歷史發展比本地早，有歷史記載最早的圍村是南宋興建的梅縣松口蔡家古故居。表面看來，本地圍村的建築形式明顯受到鄰近地區的影響，但也不乏自己的特色。



▲早年錦田吉慶圍及護河
▲本地圍村多為富庶家族所建，用料比較講究

從整體上看，錦田吉慶圍與龍南縣西關新圍的平面布局極為相似，整個村落的房屋都是由一道厚厚、有更高樓的圍牆所保護。不過，西關新圍的平面布局是門堂屋的典型代表，在中軸線兩旁的建築都是相對稱的，而所有重要的建築物——大廳、祠堂，都是排列在中軸線上；但本地圍村的軸線卻是空間的通道，例如吉慶圍中間的通道由門樓開始直達後圍牆中間的祠堂，而龍躍圍的中軸線主盡盡頭則是神壇。直至今天，學者還未能解釋這種不同空間布局的原因。

本地圍村的平面布局多為正方形或接近正方形，而唯一的入口開在圍牆的正中位置。當然亦有例外，例如在十九世紀興建的松柏客家圍，及在粉嶺龍躍頭圍圍入口都不是開在圍牆中央。在圍村的入口，一般都建有門樓，而門樓與角樓均是防止敵人進攻之主要建築設施。在圍村的建築，門樓不是一個簡單的小型城門，也有暗藏水坑，在敵人用火進攻時，可以放水保護木門不被火燒毀。

青磚圍牆用料講究

無論是哪一種平面布局、不同大門位置的圍村，圍牆內的房屋都是依據一個縱橫交錯的里巷網絡格式擺設，排列得井井有條。公用和私用的空間有明顯的劃分。本地圍村的房屋都是集中在圍牆內的內庭，除了後圍牆中央的祠堂或神壇外，厚厚的圍牆也用作生活輔助設施的建築空間，例如廚房、倉庫或飼養家畜的地方。人口不斷增加的壓力迫使這些空間改作居室之用。這些改變使圍牆空間的使用較接近嶺南圍村圍牆的用途。

事實上，在廣東及福建一帶，無論是客家圍土樓、各種形式的圍村或圍屋，厚厚的圍牆都是分割居住空間，如果是多層高圍牆，這些居所便成為獨立的多層（複式）單位。

廣東一帶圍村的厚圍牆由於都作居住單位使用，所以屋頂都採用傳統的瓦覆蓋斜屋頂建築模式，這與本地可供通道的圍牆平屋頂有顯著的不同，本地圍牆的平屋頂在防禦時方便互相照應支撐，在平日則作為一個晾曬穀物的平台。

如前文所述，本地圍村多為富庶家族所建以保護家族之財產，所以用料比較講究（廣東一般圍村所用的材料大多因地制宜，所以多用夯土）。本地圍村的圍牆牆腳及基座都是用花崗石砌成的，花崗石牆腳的高度不一，視圍村的財力而定。圍牆則用青磚砌成，牆的厚度如粉嶺龍躍頭圍可厚達一米。大門是整個圍村防禦的重點，所以非常注重，例如吉慶圍的熟鐵花鐵門，不但達到堅固的功能，鐵門上之紋飾也能顯示圍村之財富。

(摘自《香港建築百年》，四川美術出版社)

蔣百里梁啟超筆墨緣

□許逸雲

蔣百里（一八八二—一九三九），名方震，別號滄寧，筆名飛生。浙江海寧硤石人。曾留學日本，並赴德國實習考察軍事，民國時期傑出的軍事理論家。

蔣百里不但以軍事理論家著稱於世，在文化學術上也頗有貢獻。

一九一九年蔣百里從德國歸來後，寫了一本《歐洲文藝復興史》，在「導言」中指出：「文藝復興，實為人類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萬卉齊開。……綜合其繁變紛紜之結果，則有二事可以扼其綱：一曰人之發現；二曰世界之發現。」

宣揚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所高舉的「民主、科學」兩大旗幟的時代精神，被梁啟超評為「極有價值之作，述而有創作精神」，一九二一年問世後，十四個月內連續出了三版。

有趣的是，這部約五萬言的論著成稿後，蔣百里特請梁啟超為之作序，不料梁氏下筆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寫了洋洋五萬字，篇幅與原書相等。梁啟超自覺「天下固無此序體」，只好另外再寫一篇短序，而將此長序取名《清代學術概論》，單獨出版，又反過來請蔣百里為該書作了序言，誠為空前未有的文壇趣事。

(摘自《文苑佳話》，商務印書館)

文壇趣事

葉聖陶妙筆生花

□朱恪超

妙聯賞析

一九四六年，著名畫家豐子愷由大後方歸來，寄寓杭州西湖招賢寺附近。當夕陽西斜之際，畫家經常站在家門口石階上眺望遠景。有一天，豐子愷又在遠眺，頓時觸景生情，不假思索地口中吟出一句上聯來。

聯曰：

門對孤山放鶴亭

但是，一時之下，卻怎麼也想不出下聯來，於是只好暫付闕如了。

過了幾天，上海開明書店經理章錫琛來訪豐子愷。豐子愷便將此事說了，章想了想說：「可以這樣對。」他對的下聯是：

居近岳廟招賢寺

對過之後，章覺不妥，可是他與豐子愷一下子也沒想出更合適的詞來。章錫琛回上海之後，就把這副對聯交給葉聖陶過目。

葉聖陶也熟悉杭州，遂用筆將「岳廟」改成了「葛嶺」，這條下聯則面目一新。

聯云：

居近葛嶺招賢寺

但是，豐子愷沒敢把這經三個人之手而成的對聯貼在門上，他說，我是怕遊客誤認為這裡也是風景點，不斷有人跑進家裡張望啊！

小析：豐子愷上聯，觸景而發，嵌入「孤山」和「放鶴亭」兩個地方，字字都是實情，欲對下聯必須照此辦理，難怪一時無着；章經理下聯，以「居」對「門」，以「岳廟」和「招賢寺」分別對「孤山」和「放鶴亭」，尚屬工整，但有一點，「廟」、「寺」共存一聯，犯了規格，當然不妥；葉聖陶改聯，換掉「岳廟」，改成「葛嶺」，不僅力避上述毛病，而且以「嶺」對「山」對仗更為工穩，妙筆生花，信手拈來，文學泰斗，當之無愧。

(摘自《古今巧妙對》，中州古籍出版社)



大珠小珠落玉盤

王鉅科 攝

邵飄萍題寺院碑記

□李遠榮

名人軼事

邵飄萍是浙江東陽紫溪村人。村西一里許，有一唐代古剎雲峰寺。此寺在當地頗負盛名。因年久失修，三間大殿和五間西廂瀕臨頹頹。一九二三年，寺僧和村人動議重修，但募捐不到足夠的修葺資金，便由邵貴祿出面，寫信向正在北京辦《京報》的堂叔邵飄萍求助。人們知道邵飄萍向來慷慨樂助，但他是「五四」運動先驅者，撻伐封建迷信不遺餘力，重修雲峰寺之舉，會得到他資助嗎？

在他撰寫的批判宗教觀念的文章中，他認為「宗教之與科學真理，如水火之不能相倚。故科學愈發達，真理愈昌明，則信仰科學真理之人數益多，信仰宗教之人數日益減少。以是推演，信宗教之事將來可至於絕對無有。」在他看來，宗教是一種歷史現象，家鄉農民信菩薩，禁止則於事無

補，重要的是疏導教育。他很快覆信故里，答應捐助。

不久，邵貴祿進京探親，邵飄萍慨然捐洋二百一十五元，叫他帶回紫溪，資助重修家鄉寺院。

修葺雲峰寺之事即將告成時，邵貴祿收到堂叔邵飄萍來信。拆開一看，裡面附有一篇應村人而撰的《重修雲峰寺大殿並西廂記》，題目用兩道紅杠紅劃出，文中寫道：

余素不信宗教，於佛教未末之研究。然聞村人有重修雲峰寺之舉，欣然樂助其成。蓋不重宗教而重祖宗之遺澤也。……唯山川靈氣、祖宗遺澤，賴斯寺而長存。所謂佛者，亦歷史上一可愛之陳跡而已。後之視今，猶今視昔。願我族人，其世世永寶，萬代無疆。

村人選用上好青石，磨製了一座石碑，刻上碑文，立於大殿內西側。邵飄萍為雲峰寺作記的消息不脛而走，傳遍四鄰八鄉，甚至鄰縣許多

人也不惜遠道而至，特意來看這篇碑文。據紫溪年長者回憶，永康縣一些穿長衫、戴眼鏡紳士模樣的人，坐轎



▲邵飄萍為家鄉出錢出力

子來到雲峰寺。他們無心領略四周秀絕景色，也不急於參拜裝飾一新金光閃爍的巨佛；進得寺院，便駐足碑前，琅琅讀起楷書鐫刻的碑文，始而歪頭側目，繼而皺眉蹙額，終而不住地搖頭晃腦，以拐杖擊地，連連嘆道：「真乃奇文！真乃奇文！真乃奇文！」古往今來，伽藍碑文多矣，可他們從未見過被佛教徒視為聖潔之地的寺院裡，有過這等開篇便言「不信宗教」，公然否定神佛存在的奇特碑文！出了雲峰寺，他們見農夫在田間勞作，禁不住讚嘆：「你們邵家，可出了個了不起人物啊！」

這篇碑記是邵飄萍在家鄉唯一遺文。解放後，寺宇在一次特大災中傾塌，石碑埋沒於瓦礫叢中。村裡農民邵新富怕碑文泯滅不傳，一字不誤地抄錄下來，珍藏至今。重修雲峰寺時，在紫溪小學執教的陳景灝老先生，仍能大略背誦碑文。

六十年代初，人們把石碑抬進村裡，現已成為珍貴的歷史文物。文革十多個春秋的風風雨雨，寺內眾多的石碑已不知去向，獨有此碑在。

(摘自《學海軼聞趣事》，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

關南施與《蘇絲黃的世界》

□林鼎

關南施，一九六〇年憑影片《蘇絲黃的世界》踏上了國際電影的舞台。從難忘的代表作《蘇絲黃的世界》到歌舞劇《花鼓歌》的精彩演出，關南施成為首位在西方電影界成名的亞洲女演員。

關南施，原名關家倩，一九三九年生於吉隆坡，原籍廣東番禺，母親為英國人。

關家倩出生後不久來港，兩歲時逃避戰亂，移居昆明；戰後回港，在瑪利諾書院就讀，再到英國深造，畢業後入倫敦皇家芭蕾舞學校。

一九六〇年關南施回港，適值派拉蒙為《蘇絲黃的世界》招考女主角，關南施應聘入選，一舉成名，翌年演出《花鼓歌》，其後演出二十多部影片。

一九七四年起，關南施在香港及台灣演過不少影片，又曾在香港經營電影器材租賃公司及協助西片在香港拍攝外景的業務。她在《李小龍傳》後再沒有在銀幕露面。

關南施是首位在西方電影成名的亞洲女星。她的成功，對以後進軍西方電影市場的亞洲裔演員影響很大。



▲關南施於一九六〇年憑影片《蘇絲黃的世界》踏足國際電影舞台

昨夜星光